



思想政治教育前沿译丛

SIMASO ZHIDAO JIUYU QIANYAN YI'AN

杨晓慧 主编

Bringing in a New Era in Character Education

品格教育新纪元

[美]威廉·戴蒙 主编

刘晨 康秀云 译

Bringing in a New Era in Character Education

品格教育新纪元

[美] 威廉·戴蒙◎主编

刘晨 康秀云◎译

责任编辑:武丛伟 钟金铃

封面设计:汪 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品格教育新纪元/(美)威廉·戴蒙 主编;刘晨,康秀云 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2

(思想政治教育前沿译丛/杨晓慧主编)

ISBN 978 - 7 - 01 - 015428 - 2

I . ①品… II . ①戴…②刘…③康… III. ①品德教育-研究-美国

IV. ①D771. 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54352 号

品格教育新纪元

PINGE JIAOYU XINJIYUAN

[美]威廉·戴蒙 主编 刘晨 康秀云 译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3

字数:180 千字

ISBN 978 - 7 - 01 - 015428 - 2 定价:3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Bringing in a New Era in Character Education

Edited by William Damon

ISBN：978-0-8179-2962-6

Copyright © 2002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First published as “Bringing in a New Era in Character Education” by the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California, U.S.A.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授权由人民出版社独家出版并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15-4199

总序

问题是时代的注脚，时代是问题的集结，理论则是在思想中把握到的时代。理论对时代问题的把握与破解，折射着人类理论思维发展的高度，也推动着人类实践探索的前进和深化。马克思说：“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

当今时代是个全球化的时代。伴随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日益紧密，不同思想文化间相互激荡、彼此碰撞，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不断向纵深发展。在此情况下，我们所面临的“中国问题”越发具有时代性和世界性，反过来世界经济文化发展大环境、大趋势也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中国进程”。中国与世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正因如此，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人类和谐共处、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先后六十多次论及“命运共同体”问题，充分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人面向未来的长远眼光、博大胸襟和历史担当。

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来说，我们应该深刻领会、努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直面时代问题、关切人类命运的情怀和视野，自觉从当代中国实际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凝练揭示出复杂现象背后的重大时代性命题，并以理论的方式回应和

破解这些命题，从而对外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对内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最为根本的社会责任和最为深层的理论自觉。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实践传播的重要力量，也要顺应时代发展，推进自我创新。应该看到，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外部环境已经由间接点位式面向世界转变为直接全方位面向世界。更加开放的外部环境给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广阔的世界舞台，也使之面临着多元文化交融交锋交汇的严峻挑战。如何既利用好世界舞台以广泛吸收借鉴不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教训，又确保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建设发展的正确方向，是全球化时代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重要课题。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破解全球化时代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既要立足中国，也要面向世界，努力在中外文化的交流互鉴中打造兼具中国风格与时代特征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体系，从而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为此要坚持“以我为主、学习借鉴、交流对话”。“以我为主”就是要坚持中国立场、聚焦中国问题、彰显中国价值，确保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始终担负起“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基本职责。“学习借鉴”就是要树立自信开放的世界眼光，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不论发展到什么水平都虚心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的要求，学习借鉴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特别是国外道德教育、公民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相关教育形式的有益经验和做法，从而了解世界、壮大自己，始终掌握中外文化交流的主动权。“对话交流”就是要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加强与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交流互动。总之，全球化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要在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立场的基础上，树立国际视野，加强对外交流，立足对中国发展的深刻把握、对时代主题的深刻理解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守，在穿透不同文化异质中捕捉时代精神、发现价值活力，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提供有益借鉴。这就是新时期加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意涵与根源所在。

二

做好全球化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要加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也需要加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是创新发展、科学发展与内涵发展的有机统一。其中，创新发展是动力，科学发展是原则，内涵发展是抓手，三者相互联系，共同构成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总趋势和总要求。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离不开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优良传统和成功经验的总结继承，也离不开结合新的时代背景与实践条件的积极创新。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创新发展，关键在于充分调动学科内部各要素的发展潜能，通过强化学科管理、整合学科力量、优化学科体系，不断增强学科建设服务实践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与此同时，也要立足开放多元的时代背景，进一步拓宽学科视野，将学科建设放置在中外文化交流对话的历史进程和实践活动之中，不断加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通过与国外相关教育形式的切磋比较，找准自身定位，汲取发展经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性和有效性。

科学发展的核心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然而，一门学科在建设初期由于建设任务比较繁重，往往不能平均使力，只能有所侧重，以局部突破带动整体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也是如此。学科初创之时我们在基础理论研究上建立了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思想政治教育史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等四个主干学科领域。其中，原理、方法论、史论的建设投入力度较大、产出成果较多、发展速度较快，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原理体系、方法论体系和史论体系，但比较研究相对滞后，致使其成为学科体系中较为薄弱的板块。立足全球化时代思想政治教育“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客观需要，推动学科科学发展，应该在进一步深化原理、方法和史论研究的同时，加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努力形成学科建设合力，推动学科建设整体跃进、协调发展。此外，加强比较思想

政治教育，也有助于增强原理研究对不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解释力，提升历史研究的恢宏感，推动方法研究从局部实践经验的归纳上升为具有广泛意义的方法论指导。

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正在从注重规模扩张的外延发展转向注重质量提升的内涵发展。破解这一问题，不仅需要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国特色和中国经验，还要将之放在各国历史文化背景下，把握其存在发展的具体样态、历史成因和文化品格。这就需要在更为广阔的世界视野中，通过方法互动、资源汇通，透视不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理论品质与实践策略的异同，从而更好地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和规律。

总之，顺应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趋势，促进学科建设的创新发展、科学发展与内涵发展，需要加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

三

我国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兴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名称的正式出现，是在 1988 年 6 月在广州召开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会议上。从学术研究角度第一次提出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并把其正式列入教材编写计划之中，是 1995 年 10 月在北京召开的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会议。此次会议以课程建设为主题，讨论编写被誉为国内第一本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教材《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苏崇德，1995）。后来又陆续出版了多本教材，并开始设置“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方向，招收硕、博研究生。与此同时，人们用“名实之辩”解决了国外是否存在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用“实践论”解决了不同政治制度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可比性问题，使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获得了广泛认可，具有了学术上的“合法性”（陈立思，2010）。

面向未来，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还面临着夯实理论基础、创新研究范式、整合研究力量等任务。但一个前提性、基础性的工作就是加强学术资

总 序

源的开发，特别是要拥有域外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理论和实践的第一手资料。这就需要开展深入细致的文献翻译工作。然而，目前围绕国外思想政治教育（德育）理论及实践，学界虽不乏翻译力作，但成规模的译丛还不多见，还难以满足比较思想政治教育长足发展的需要。

正是从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背景和学科立场出发，我们精选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相关领域较具权威性、代表性、前沿性的力作，推出了具有较高研究价值与应用价值的系列翻译作品——《思想政治教育前沿译丛》（以下简称“译丛”）。

译丛坚持“以我为主、学习借鉴、交流对话”，旨在丰富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在国外译著、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等方面的学术资源，实现译著系列在学科定位、理论旨趣以及国别覆盖上的多重创新，为推动中外相关学术交流和对话提供支撑。

译丛力争选取与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相关性较大、国际学术界反响较好的学术著作，既译介国外相关领域知名专家学者的扛鼎力作，也译介对这些代表人物的理论有见地、有深度的研究专著，以及对美国、日本、俄罗斯、加拿大等国相关教育形式有独特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以期为广大读者掌握国外相关领域的前沿动态提供方便。

译丛主要面向三大读者群：一是教育学、政治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等领域的理论工作者；二是教育主管部门决策者、中小学及高校一线教师、辅导员等教育工作者；三是思想政治教育、道德教育、比较教育等相关专业的本科生与研究生。

译丛在翻译过程中特别重视研判作者的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立场，努力按照国家要求和中国实际对所选书目及其内容进行甄别。但是由于作者所处国家及学术立场的限制，有些内容可能仍然并不适合于我国国情，需要读者在阅读时各取所需、为我所用，批判地吸收其中有益的成分。

杨晓慧

2015年5月于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

目 录

导 言 / I

第一 章 在高度自治时代传播道德智慧 / 15

赖以生存的箴言 / 19

赖以生存的荣誉准则 / 24

结 论 / 30

第二 章 道德教育如何回归美国校园 / 34

亚里士多德与卢梭的较量 / 36

价值中立儿童 / 41

改革者究竟错在哪儿 / 44

两个具有社会化障碍的男孩 / 45

改革之风 / 47

第三 章 品格教育的科学 / 52

关于概念术语的探讨 / 52

品格教育：当前发展状况 / 54

什么是品格？ / 55

品格发展 / 57

品格来源 / 61

家庭教育以及品格发展 / 62
在学校中什么是真正有效的? / 63
有效方法的总结 / 65
今后的品格教育 / 68
我们将何去何从? / 69

第四章 道德典范 / 70

道德心理学新方向：人格与品格 / 75
应用与结论 / 83

第五章 培养禁欲主义勇士 / 86

伟大的新禁欲主义 / 89
健康的体魄与健全的心智 / 97
文明的礼节，崇高的道德 / 101
控制愤怒情绪 / 105
结 论 / 110

第六章 品格教育的社群主义视角 / 113

品格教育的原则：概览 / 114
讨 论 / 117

第七章 构建民主社群：道德教育的根本方法 / 126

科尔伯格的社会学转向 / 127
民主实践 / 131
教师角色 / 135
通过集体规范构建社群 / 139
结 论 / 142

目 录

第八 章 谁的价值观 / 144

争论一：高等教育不应关涉价值观问题 / 146

争议二：谁的价值观 / 149

争议三：高校进行道德与公民教育为时已晚 / 155

争议四：大学生是职业培训的主要消费者群体 / 158

争议五：道德与公民教育会造成知识缺憾 / 159

结 论 / 160

第九 章 民主社会中的道德与伦理发展 / 163

机构的合法性 / 165

回应策略 / 166

关于权威问题的思考 / 169

作者介绍 / 172

索 引 / 176

译后记 / 194

导 言

威廉·戴蒙 (William Damon)

如果说美国现代教育体系确实发生过真正的变革，通常这一进程也是缓慢的，然而，近年来我们却目睹了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美国教育以令人震惊的速度，终结了其在分离智育和德育上的失败尝试，不再将智育作为唯一的合理范畴。从 K-12（从幼儿园到十二年级）学校到高等学校，各阶段的教师已经开始关注学生的价值观问题，并且勇于担当优化学生品格的责任。

这绝不是一项史无前例的举措：事实上，这是一次对综合性更强的“全面学生”计划 (“whole student” agenda) 的回归，而这一计划也是美国学校在教育领域最初三百年中所付出的努力。然而，在 20 世纪中后期，教育者发现自己已经卷入了一个高度专业化、世俗化以及受知识驱动的后现代世界。大多数人据此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传统教育使命中的道德部分已经被废弃，传统的“代替父母制”已经消失，道德相对主义随即出现。主流观点认为教育者应该促进学生批判思维和宽容品质的培养，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内容并不被视为道德价值观念，而是处于价值选择争议领域之外的中立的、无效的位置。这种观点其实是一种错误的理解，导致很多重大青少年伤害事件的发生，因此迟早会被摒弃。幸运的是，关于这一问题的修正出人意料地迅速出现，当我们步入 21 世纪时，这种良性改变正在顺利进行中。

作为这项修正的倡导者，我已经注意到了这种改变，甚至是联邦政府层面的典型改变——不是引导文化趋势，而是对这种趋势作出反应。在

克林顿政府执政初期，教育部长理查德·赖利（Richard Riley）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致辞，与会者包括诸多像我一样的品格教育者，我们正在努力寻找在K-12教育阶段课程中再次引入道德内容的方式。赖利部长非常赞同我们的目标，但在针对一个问题作出评价和回应时（多年过后，我无法逐字引述其原话），他认为自己并没有发觉联邦政府和公共学校在这项努力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孩子的价值观只是个体问题，因而培育价值观的职能需要保留在家庭和教会。

在随后的三年中，大量媒体广泛报道了年轻人伤害别人和自己的行为，这些行为的发生往往是由于他们受到了道德选择的误导。在1996年“国情咨文演讲”（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中，克林顿总统指出：“美国所有学校都应该开展品格教育，传递正确的价值观，培养良好公民。”赖利部长在任期间，联邦教育部发起了一个项目来支持这种理念。四年后，在2000年的总统大选中，一名主要候选人（事实上是当选者）小布什先生频繁地在竞选活动中承诺要在美国公立学校中大力开展品格教育。自小布什总统就任以来，他将对该项目的联邦资助增加了三倍以兑现承诺。在我的大部分工作生涯中，我坚信品格教育，但我从未想过在我有生之年能看见它成为总统选举中的一个重要竞选承诺，也从未想过它能获得最高政府如此大力的支持。

目前，品格教育的理念已经得到公众的普遍接受，并获得两个政党高层官员的共同认可，这标志着我们已经进入品格教育的新纪元。这是一个绝好的开端，机会之窗将会持久敞开，以允许更多有价值的努力进入其中。然而，如果这些有价值的尝试陷入泥沼之中，被并不重视但仅想利用这一趋势的人搁置一旁，所有的这些机会之窗终将关闭。开启品格教育新纪元，如何能对我们中小学以及高校的学生产生真正有益的影响？什么原则和途径能够为品格教育提供坚实的基础，并帮助其继往开来，使之再次成为我们教育议程中一个稳定的组成部分，而不仅是另一种趋势？在今天的教育系统中，我们又需要克服何种障碍，创设何种机遇来促进新品格教育的发展？本书的目的即是试图针对这些问题提供初步回应。参与本书撰写的各位作者均是当下在品格教育领域最具创新精神的思想者，他们并未

受到导致当下学校道德教育偏离正轨的各种错误观念的束缚，力图在各章中提供独创的解决办法。

本书中的每一章都为研究“今天的品格教育到底需要什么”这个问题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其中有两大主题贯穿全书：第一个主题是达成一种共识，即需要将基本道德准则传递给年轻人，且各教育阶段的教师均应承担传递这些核心准则的重大责任。关于“到底是谁的价值观”这个问题，即谁将吹响道德教育的战斗号角来重新开垦学校道德引导的“荒芜之地”，对诸多学者而言仍是一个还未形成定论的问题。应该传递的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指的是世界范围内所有具有责任感的成年人，他们所关心的是年轻公民将会继承的文明的质量与未来。本书中的第二个主题是形成一种共同的决心，以消除反对品格教育的陈词滥调，这些反对观点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消解了品格教育领域最有意义的努力。如果想要实现真正的进步，需要以一种更完整、兼收并蓄且无所不包的方式来超越并取代这些挡住去路的反对声音。

x

习惯与反思

多数家长明白，培养孩子端正的行为及在复杂、困难的情况下作出正确判断的能力是十分必要的。每一个孩子都需要获得可靠的习惯和过硬的推理技巧。那些未能获得这两种有益品质的儿童，即便具有善心美意，对他们自身而言也是不值得信赖的。或者，他们容易受到自己难以掩藏或估量的恶意因素的影响，而变成机器人。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当下竟然有学者将这两种目标——培养良好的习惯和对正义等道德问题的清晰推理能力——对立起来。哲学家伯纳德·威廉姆斯^①（Bernard Williams）批判

① Bernard Williams, *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了在哲学领域将“美德论”（认为美德只是持久习惯的性格结果）和“正义论”（倡导不断思考能够创造社会契约与公正意义的程序）对立的错误观念。威廉姆斯指出，美德和正义之间没有任何互不相容的地方，任何完满的道德生活均渴求二者的共同实现。威廉姆斯注意到，这两个道德目标拥有共同的敌人——“伪善”——一种将“不作为”和“妥协”合理化的自利趋势，以及一种通过不道德方式来追求想象中道德目标的意愿（往往是渴望）。

然而，心理学历史上存在一个将“习惯”与“反思”对立的怪异现象，这使哲学上的这种困惑变得更加复杂。在关于道德发展的科学领域，20世纪中两大主要阵营是：行为主义和认知主义传统（由于薄弱的研究基础，传统精神分析流派始终被孤立在学术界之外）。行为主义强调人对规则的遵从以及行为习惯模式的调节功能；而诸如皮亚杰和科尔伯格等认知主义者则强调人的推理能力和自主判断。
xi

通过这种方式对人进行区分，未必能满足科学的研究的需要，却衍生出另一种争论。这种争论是十足的教育灾难，最终将影响年轻人发展的各个方面。关于“习惯”和“反思”的这种毫无意义的对立，是从教育心理学和教育哲学领域的理论与实践中移植来的，致使品格教育几十年来的宝贵努力出现了两极分化。现在我们需要超越这些不足为道的争论，将“全面学生”作为我们道德教育的目标——通过培养习惯与反思、美德与理解，以及包含评价、情感、动机、行为和自我认同感的各个系统，为学生现在及未来的道德生活提供帮助。

个体与社群

我们力图培养每一个儿童的道德观念，但仍有一些人试图在关于道德观念的争论上费尽心思地编章绘句。在所有观念形态中，极端观点一直在扩散。有些观点认为道德在本质上是生物学的，深深根植于个体的基因

编码中，暗示着人们天生具有不同程度的道德水平。这种观点告诉我们，除了识别出那些“恶的种子”，为“善的种子”肃清道路外，教育是无能为力的。甚至对于“家长是否重要”这个问题，近年来竟然也逐渐认真地争论起来。在其他极端观点中，一些人坚持认为所有的道德真理都存在于社群之中，极端个人主义是我们问题的核心，道德教育者的任务就是要促进文化传播，并增进人们的相互依赖意识。然而，没有一种观点能够给予由来已久的道德理想更多的信心，例如个人良知、高尚意志或能够鼓舞人心的社会行为。

这种关于个体与社群之间的对立假设，其实是一种基于次级文化理论的流行观点。这种观点通常认为西方道德（尤其是美国的）强调个人权利和义务，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通常引用日本为例），其公共取向更为盛行。人类学家^① 更为严肃认真，他们清楚所有这些关于个体与社群的理解是无处不在的。事实上，如果个体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能认清并保护他们的权利（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或者不能建立关于共同善的公共意识，任何社会如何得以存在？虽然不同的社会在如何平衡及表达道德取向、对不同道德观念的强调程度以及影响他们的文化传统等方面各有差异；但道德始终是一个关乎处理个人与集体关系的问题，因此儿童必须为这两者做好准备，在需要的时候，学习他们的社会背景，并遵从他们的良知。对教育者而言，道德意味着传授共同价值观；同时，帮助每一个儿童获得个体道德认同，使他们在任何境遇中都能始终维持道德意识——无论愉快或残忍、鼓舞或堕落——正如他们通常在生命中所邂逅的那样。

^① R. Shweder, *Thinking through Cultures: Expeditions in Cultural Psycholog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